



田余庆

# 师友杂忆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91

# 师友杂忆

田余庆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师友杂忆 / 田余庆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5  
(海豚书馆)  
ISBN 978-7-5110-2026-0

I. ①师… II. ①田…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632号

书 名: 师友杂忆  
作 者: 田余庆

责任编辑: 郝付云 张 镛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3.25  
字 数: 45千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026-0  
定 价: 1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 序

朋友来，多次提及，“文革”后我所写怀念已逝师友短文，倾注了情意，也可能留存了一些旧闻，当时多未公开发表，想找来整理付印。此前，已有出版社提过此事。朋友搜集这类文字，几经反复，不厌其烦。好在篇数、字数不多，我过目稍改，凑成了这个小册子。

我手懒，从无写日记或札记的习惯，也不爱写应用文章，写过的多半未存手稿，偶存的也未必能找到。所以杂忆所及多是感情上留有某种印象的事物，而且多是各种纪念会上被推所作的发言稿，或是编纂纪念册时写成的短文，感情是有的，深意却

说不上。有几位常在念中的老师，向达先生，张政烺先生，邵循正先生，总想有点表示，由于一时未想到新鲜资料，终未成文。汪篔先生谊兼师友，相交本深，后来同遭厄运，成为“异类”，不敢再多有接触。他后来的事，更是令人伤痛无已。我至今未有文字表达哀伤之情，藉此机会留下一笔，永志不忘。杂忆所及北大师友，多是受过苦难的，尤其是翦伯赞先生，是大苦大难。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批有过辉煌但已年迈的文化人？

杂忆有的篇目是出版物索序之作。为书写序，深觉不易，我所不敢。婉辞不成，说好只当前言、附志来用。纪念陈寅恪、汤用彤等顶级大师，我写了学术论文，寄托崇敬之情。这些与杂忆不同，附志于此。

田余庆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时年九十出头



## 目 录

历史主义无罪 (1)

在北大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百年  
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17)

清明何处祭孤魂  
——在翦伯赞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27)

忆郑师 (34)

邓师周年祭 (40)

周一良先生周年祭 (48)

《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影印本前言 (61)

接替陈寅恪，树立了一个新的路标  
——《唐长孺全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68)

清淳勤勉老书生  
——商鸿逵先生十周年祭（74）

睹书伤逝  
——纪念邃耀东先生（79）

# 历史主义无罪

翦伯赞教授，史学界的又一棵青松，在严寒中凋谢，已经十五年了。

我初次见到伯赞先生，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九四四年。那时我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流亡到了重庆，有机会听到许多著名进步学者的学术讲演，伯赞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建国后，我对伯赞先生谈及此事，他回忆是陶行知先生邀他去讲的。他说：“你们是经过颠沛流离的学生，我很愿意同你们见面。讲历史，目的是为了抗战，为革命争取青年。至于讲了什么，已没印象，得鱼忘筌嘛！”我说只记得言外之意是骂重庆政府抗战不力，他连声

道：“你是得其意而忘其言，得意忘言。”

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想转学历史。伯赞先生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先辈们使我深信，医生诊断不了社会的病症，而历史学家可以知古鉴今。

那时候，我对伯赞先生的突出印象，是热情奔放，文采风流。我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对他非常景仰。我佩服他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而研究历史的精神，佩服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总是结合抗日战争的需要，选定写作题目，深入浅出，说古论今，以生动的文笔，严密的逻辑，把读者带进他的思路，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他的影响。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先生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

伯赞先生等先辈的历史著作除了以精湛的古史研究成果启迪读者以外，更重要的是传播唯物史观，开拓历史学的新道路。伯赞先生发表于一九三八年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九四三年的《中国史纲》第一卷，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史纲》

第二卷，都是极有影响，使史学界为之鼓舞，使一代青年深受教益。伯赞先生和其他先辈们在困难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我们追念。

过去我同伯赞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印象十分深刻。

建国后，伯赞先生到了北京，我有机会较多地得到他的教诲。我听到他自豪地谈及过去在史学领域的战斗生活。他谈到在建国后的新条件下，历史科学处在新的起点，人们须要对过去的斗争有所回顾，总结得失，迎接新的斗争，而不能完全与过去一样。那时候，有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这样做了。伯赞先生同他们一样，以科学态度对待过去，在学术界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伯赞先生说，过去，写历史文章就像制造炮弹，总想使它具有尽可能大的打击敌人的威力，总要千方百计地把历史同政治斗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此，有时候就以古喻今。当时政治压力很大，斗争很激烈，条件也很艰

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也没有必要的图书资料可用。他说，那时写出的东西，现在检查起来，史料显得贫乏，有些还免不了有强加于历史的见解和不恰当的比附。他认为现在社会条件起了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因此，可以也应当对历史科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坚持斗争精神而又避免出现过去的毛病，这样才能使历史科学繁荣起来。一九五二年伯赞先生《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就是为此而写的。文章说：“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的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过去出现这些现象是情有可原的；现在史学界出现类似的现象，混淆古今，而且形成一种倾向，就值得注意了。所以伯赞先生列举了当时所见的这种倾向的许多例证，一一加以分析。

伯赞先生很注意运用自己的经验来观察史学界的各种问题，并努力发挥自己的影响。他反复宣

传，要使历史科学具有战斗力，首要条件是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切忌削足适履。这可以说是建国后若干年来伯赞先生评论历史研究状况时的基本主张。他在上述论文中提到、而在六十年代详加论证的“历史主义”，也是从这个基本主张概括出来的。

伯赞先生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讲话时，多次勉励他们说：“你们学习历史，既要学会使用显微镜，又要学会使用望远镜。前者培养过细功夫，使你们认识历史事实，洞察幽微；后者练就远大眼光，使你们能纵览全局，把握要害。两者必须结合使用，缺一不可。”他还说，用显微镜观察，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用望远镜观察，是研究历史的向导。他后来常常使用史论结合的提法，也是显微镜、望远镜并用的意思。当然，所谓并用，有各种各样的用法。伯赞先生建国后的文章，有的偏重于阐发理论，有的偏重于探讨具体问题，不论是哪一类，他都力求在文章中做到言之有物，物中见理。在我看来，伯赞先生研究历史，在史论结合方面，

同解放前比，达到了新的高度。一九五四年，他写了《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九五五年，他写了《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以后还写了不少其他的历史论文。这些文章在史和论两方面都下过大功夫，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佳作。

伯赞先生非常重视史料整理工作。建国之初，他参加发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并主编其中《戊戌变法》、《义和团》两种。后来，他还主持了《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的编辑工作。他有一个比较完整地汇集秦汉时期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计划，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没有落实下来。他重视工具书的编辑。他把上述这些工作都视为历史科学的基本建设，主张大规模展开。他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写了文章，提倡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工作。

伯赞先生常常教育后进在科学上要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他自己心在学术，总想为历史科学多出力气，多做建树。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



气氛较浓，教学很有成效，师生们都非常敬佩他。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理论战线出现了混乱，极左思潮开始泛滥。据我回忆，伯赞先生面对这种混乱状况，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感到不安。学校里反复兴起的学术批判，所坚持的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被混淆在一起。面对这种状况，伯赞先生疑团越来越大。科学良心使他不得已于言。他顾不得开顶风船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在六十年代开头的几年里，写了几篇理论探讨的文章，主要的有《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等。他想作一次努力，试试看能否对纠正史学领域中的某些不良风气产生积极效果。

《初步意见》一文的见解，是他在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书时同执笔者讨论如何写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章经过他长期的酝酿，反复的修改。《几个问题》一文，实际上是前一篇文章的续篇。这两篇文章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极左观点而